

从词汇比较看明清以来黔北方言的变迁

史光辉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1121)

摘要: 从明末《蜀语》到晚清《俗语》，川黔方言一脉相承，是黔北方言的古代层次。《蜀语》之后，湖广移民将湖广话带到川渝地区，进而延伸至相邻的黔北，形成新的川黔话，是黔北方言的后起层次。明清以来，与川渝受移民影响形成新方言不同，黔北既保留较多古川黔方言词汇，又出现大量新的川黔话词汇，经历的是“优势方言”起主导作用的变迁，而非“移民方言”。

关键词: 《俗语》；明清；黔北；西南官话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20)03-0001-08

贵州黔北地区位于川、黔、渝三省市交界地带，是“川黔派西南官话”（李蓝 2009）的核心方言片之一，黔北方言的来源及历史层次能够反映川渝黔西南官话的过渡性和连续性。《中国语言地图集》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1987）图 B6 明确划出“黔北片”，主要方言点有贵州北部的六盘水、毕节、遵义、铜仁和湖南西部的怀化。而该地图集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2012）图 B1-12 进一步把遵义方言划为西蜀片（北端道真属成渝片），把六盘水、毕节、铜仁等地方言划为成渝片，把怀化划为湖广片，反映黔北方言内部存在差异。黔北方言有两种主要成分：一是西蜀方言，以遵义话为代表；二是成渝话，以六盘水、毕节、铜仁话为代表。这两种方言成分都是在川渝方言影响下产生的。

那么，川渝方言的情况又如何呢？周及徐、周岷（2012a、2012b、2013、2016、2017）利用明末四川遂宁人李实所作《蜀语》（1644）和新的田野调查进行对比，发现“南路话”（其来源是以《蜀语》为代表的西蜀方言）已退缩至岷江以西，而明末以来大批湖广移民自东向西涌入，又在川中往东地区形成了“湖广话”（其来源是东边的“楚语”），成为今天成渝地区的主流方言。恰好与之对应，黔北西蜀片（方言点有遵义、绥阳、赤水、桐梓、道真、习水）大致与四川“南路话”相同，成渝片（方言点有六盘水、毕节、铜仁）则与川渝“湖广话”相同。

黔北的方言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清末贵州学者郑珍（1806-1864）曾撰写《遵义府志·风俗·俗语》（1841）一卷（以下简称《俗语》），收录黔北方言词汇共 352 条，其中有 349 条直接摘录自《蜀语》^①，民国时期所编《贵州通志》（1948）又照录《俗语》作为其中的“方言篇”，可见明清以来黔北方言与川渝方言是一脉相承的。现代黔北方言，姚丽娟、占升平（2012：2）认为绥阳话和邻近的重庆话、四川话比较接近，绥阳音系在黔北片中与邻近的湄潭、正安、道真等方言音系基本相同。蓝卡佳（2012：5）认为桐梓方言与黔北习水、赤水、以及四川泸州、合江一代方言接近。虽然都是遵义市境内的方言小片，但绥阳话性质上属于湖广话，桐梓话则属于南路话。而胡光斌、陈蓝心（2012：7）发现新派遵义方言的发展趋势“一是与一般川黔话逐渐趋于一致，二是向普通话语音靠拢”。这里的“一般川黔话”就是通行于今黔北遵义一带的川黔官话，其性质属于湖广话，反映遵义经历了“西蜀方言”向“川黔话”的转变。如果《蜀语》《俗语》所记川黔方言是黔北方言的历史层次，川黔话（川渝境内称“湖广话”）则是它的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文化单列课题“贵州方言词典编撰”（18GZZB28）

作者简介: 史光辉，男（仡佬），1974 年生，贵州遵义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文献语言学等。

^① 本文所用《蜀语》版本为黄仁寿、刘家和等校注《蜀语校注》，巴蜀书社 1990 年版；《俗语》版本为清道光年间刻本《遵义府志·风俗·俗语》。

现代新层次。

从《俗语》照录《蜀语》来看，到清末时期，以遵义为代表的黔北方言仍与四川方言保持相当高的一致性，这是今川、黔、渝三省市的西南官话能合称“川黔派”（钱曾怡、李蓝 2010：247）的历史缘由之一。那么，明清以来黔北方言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与川渝方言的关系如何？今天黔北的主流方言是什么？根据它与川渝方言的关系，应该有以下三种可能：（1）保留以《蜀语》《俗语》为代表的古代川黔方言，渐变为今天的黔北方言；（2）与四川方言的变迁方式一样，原有的“西蜀方言”逐渐萎缩，在湖广移民影响下逐渐形成以“湖广话”为主流的黔北方言；（3）与历史川黔方言分流，在其他因素（如行政区划变化、非湖广移民和普通话渗透等）的影响下，形成区别于“西蜀方言”和“湖广话”的新方言。我们拟通过方言文献所记词汇的比较，透视明清以来黔北方言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川渝方言的关系。

一 明末至晚清的黔北方言

《俗语》“按语”云：“地方常言有其声不得其文者多矣，明李实留意方言所撰《蜀语》，事征本原，十得七八，今悉采载。其有他处之语遵义独无者不录。”可以看出《蜀语》与《俗语》之间的渊源关系，反映了明清川黔方言词汇的面貌，有共同的川黔方言背景。但由于两书在时间上相距 200 余年，而《俗语》所志乃黔北遵义方言，且成书于遵义由四川改隶贵州百余年之后，方言地域上也形成了差异。因此，《俗语》脱胎于《蜀语》，但在共时和历时层面上，两书所反映的方言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首先，统计发现《俗语》共抄录《蜀语》词汇 352 条^①，这 352 词只留下 293 条注音条目，远低于《蜀语》的音注数量，而且删除了全部反切只保留直音，从声韵调分混的数量和所占比例看，就与《蜀语》音系存在相应的差异。比如《俗语》多出了 V 母。《蜀语》微母字与影母字混注的情况，数量上超过了微母自注的情况，显示微母已完全零声母化。而《俗语》中，微母与影母混注的有 2 例：巫、诬音乌。但微母自注的也有 2 例：目不见物曰瞽音务、香圆稻米曰稷音晚米。此外没有出现《蜀语》中类似于“日晚曰晏”这类完全反映微母零声母化的例子。因此，从比例上看，《俗语》似乎还保留着 V 母的痕迹。此外，与《蜀语》韵母系统相比，《俗语》多一个韵母 uo，少一个韵母 iu。

其次，从词汇角度看，《蜀语》中有 220 词^②《俗语》没有抄录，这说明晚清黔北方言与四川方言在词汇系统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分别考察了《俗语》抄录 352 词和未抄 220 词的共时分布^③，发现它们在外区方言的分布率分别为 16%和 21%，说明这些词在其他方言区都分布较少，具有川黔方言的地域特征，而相比之下，352 词的川黔特征更高，220 词的区外特征更高。

为进一步考察这些词汇的分布特征，我们又对两类词中使用频率、通行程度较高的 15 词在川黔地区的共时分布分别作了调查，获得以下数据：

《俗语》15 词在川黔地区 6 个方言点的共时分布调查表

表 1

《俗语》15 词	坝	涪	弹	拚	谿	焯	酢	康	隐	巴	滄	鞞	薊	璧	皴
桐梓	+	+	弹	拌	玉	-	+	园	鳃	粑	+	+	-	+	-
遵义	+	+	+	空	+	+	+	+	+	粑	+	+	+	+	+
赤水	+	□	+	□	-	-	醉	-	-	粑	+	-	-	+	-
绥阳	+	-	箊	+	-	+	+	钊	哽	粑	+	膝	-		-
成都	+	+	+	+	+	+	+	+	+	粑	+	+	+	+	+
贵阳	+	+	妥	笨	+	+	酢	□	□	+	+	+	□	+	□

① 有 3 条虽非源出《蜀语》，但也是蜀方言词汇，其中 2 条见于张澍《蜀典》卷七《方言类》“见人物之可夸者曰呜呼”、“可鄙者曰噫嘻”；1 条引自《蜀道驿程记》“谓小港曰浩”。

② 此数据根据两书的词条比较统计的，《蜀语》中有“一个条目录多个词语”的情况，我们以所记词语的个数为准，按此原则，统计出《俗语》未抄《蜀语》的词语共有 220 个。

③ 考察这些词在其他方言点的分布时，主要依据李荣（1993），并参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1964）、许宝华、宫本一郎（1999）和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2），以及笔者的调查和现代方言学者的研究成果。

《俗语》未收 15 词在川黔地区 6 个方言点的共时分布调查表

表 2

《俗语》未收 15 词	鬻	倩	瓢	赁	唱喏	端公	剜	捩	撈	晏	擗	齐铺	沔	不牡	馅
桐梓	-	-	+	-	-	+	挖	掇	撈	+	+	-	-	卯	-
遵义	+	+	+	+	+	+	+	掇	+	+	+	+	+	□	+
赤水	-	-	+	-	-	-	-	-	浜	+	+	-	-	卯	-
绥阳	-	-	+	-	-	+	挖	掇	浜	+	+	-	-	卯	心
成都	埡	+	+	-	-	+	+	+	+	+	+	+	+	不卯	+
贵阳	-	欠	-	-	-	+	-	+	撈	+	+	-	-	卯	-

说明：表中“+”、“-”分别表示有和无，确定一个方言点有无这个词，主要是从词的音和义两个方面来判定。表中标注汉字的地方，如“筑”、“妥”等，表示该方言点有这个词，但所用字形不同。标注“□”的地方，表示该方言点有这个词，但有音义而无字。

上表显示《俗语》抄录的 15 词中，在 6 个方言点都完全有分布的词语有 7 个，近 50%；而未收的 15 词中 6 个点都有分布的词语只有 4 个，仅 26%。这一组数据反映出《俗语》352 词在川黔方言内部具有很高的覆盖率，保留了《蜀语》以来川黔方言词汇的主体，是历史共性所在。而未收 220 词覆盖率相对较低，在词汇分布上显示川黔方言内部各点之间存在差异。可见，到晚清时期，黔北地区的主流方言与《蜀语》代表的明代四川方言大体仍是一致的，但在前后 200 余年间，黔北方言在词汇来源和历时演变上，都逐渐与四川方言形成了一些差异：黔北仍以川黔固有词汇为主，来自外区方言的词汇相对较少。

二 近两百年黔北方言的变迁

对比现代黔北方言与《俗语》所收词汇，发现以下几种典型情况。

（一）《俗语》有，今黔北方言仍有

这类词无论是语音特征还是用法意义都与《俗语》词汇相符，有些虽然在现代方言中只作为构词语素存在，但其性质跟明清川黔方言基本相同。

（1）《俗语》：“铺垫曰擗音霸。”黔北有擗[paʃ]单、擗床、擗铺、擗絮等词皆与《俗语》“擗”同义，其中“擗单”在毕节、大方、赫章等地床床单、垫单，其名词义是由其铺垫义转化而来的。“擗铺”在毕节、大方还表示铺床或做准备工作。《蜀语》字亦作“擗”，今川黔方言皆作“擗”。但考“擗”字本是“把（把持）”字之俗，作“铺垫”义者本字或为“尊”（蒋宗福 2002：8）。

（2）《俗语》：“电曰睽。”黔北有霍闪[xoʃ sanʃ]、扯霍闪、雷公霍闪等词，中“闪”皆与“睽”同义，均指闪电。古语“电”即指闪电，把闪电称为“霍闪”，今川黔方言皆同。此字《蜀语》作“睽”，《篇海类编·天文类·日部》：“睽，电也。”《俗语》录作“睽”，盖认为当以“睽”为其本字，《说文·目部》已收：“睽，暂视貌。”后引申为“闪烁”之义。“睽”字晚出，是“睽”变换义符产生的异体。据蒋宗福（2002：277）考证，“霍闪”经见于唐诗，其本字或当作“瞽睽”。黄侃《蕲春语》：“今吾乡电曰瞽，谓云中出电，曰掣瞽，皆音虚郭切。四川谓电谓瞽睽，扬州谓电曰睽，彼以方音读虚检切。北京谓电曰睽，音同《广韵》。”

（3）《俗语》：“村市曰场。”黔北如遵义、毕节、赫章等皆称赶集为“赶[kanʃ]场[tsʰaŋʃ]”，其中“场”即《俗语》村市之义。把集市称作“场”是明清以来，川黔方言的一个特征词。清张慎仪《方言别录》卷下：“苗人呼汉官为流官，呼上市为赶场。”但苗语“赶[kas]场[xangʃ]”，应该是一个汉语借词。

（4）《俗语》：“谷穗曰杓音吊。”黔北出杓[tiauʃ]儿、谷杓儿、麦杓儿等皆此义，黔北“杓”还可用作量词，如一杓谷子、几杓高粱，是由“谷穗”义虚化而来的。《说文·禾部》：“杓，禾危穗也。”本指谷穗垂貌，引申为悬挂、悬物，《玉篇·禾部》：“杓，悬物也。”“杓”转指谷穗，主要分布在西南官话。

(5)《俗语》：“手指文曰�音罗。”黔北�[nuoŋ]儿、�纹儿、��儿皆此义。《玉篇·肉部》：“�，手理也。”《广韵》平声戈韵落戈切：“�，手指文也。”“�”表指纹、指印是唐宋以来的通语词汇，今在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语、赣语中皆有分布。黔北方言如上引诸词中“�”是专指一种圆形指纹。

(6)《俗语》：“以盐渍物曰滥音览。”黔北溇[nanŋ]黄瓜、溇菜、溇折耳根、溇肉、溇豆芽等词中“溇”义同。“滥”本浸渍之义，引申为腌渍，《释名·释饮食》：“桃滥，水渍而藏之，其味滥滥然酢也。”“滥”即“渍物”本字，或变换声符作“溇”、“灩”，《蜀语》：“以盐渍物曰滥。滥读上声，音览。溇、灩同。”今黔北方言凡腌制或凉拌果蔬，仍多用此词。

(7)《俗语》：“搅曰槽潮去声。”黔北槽[ts'auŋ]一下、槽起来、槽上下、槽上来等词，“槽”皆指翻动、搅动。《广韵》去声号韵在到切：“槽，手搅也。”在黔北方言中，泛指搅动的“槽”一般读去声，与《俗语》相同。黔北方言“槽”还可读阳平，专指从下往上翻动，如“把最下面的槽上来”。

类似上举《俗语》中词汇，大多数是保留在今黔北方言中的。因此从历史来源的角度看，保留古代川黔方言词汇，是黔北方言的一大特征。

(二)《俗语》没有，今黔北方言有

有些词汇《俗语》未见收录，但在今黔北方言中却经见使用。这类词的来源和性质，能够反映明清之后黔北方言所受的影响。

(1)榧[k'uənŋ]，整，完物。黔北表示物整、饱满、不瘪、圆润等义，多用此词，如“榧鸡蛋”、“榧头榧脑”、“榧鸡”、“榧鱼”等，一般字作“榧”（遵义）或“浑”（毕节、沿河），音义皆同。《说文·木部》：“榧，木未析也。”《广韵》平声魂韵户昆切：“榧，大木未剖。”《段注》：“榧，凡全物浑大皆曰榧。”《说文通训定声》：“榧，今苏俗常语谓之或仑（囫囵）。或仑者榧之合音。”《蜀语》收有：“浑全曰囫囵。”而未见“榧”。而今四川方言多用“浑”字，音义与“榧”相同。今方言字作“榧”表示完整、囫囵者主要分布于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湖北广济）和吴语区，都是对古语“榧”的保留。川黔方言中的“榧”或“浑”应该源自江淮官话。

(2)穰[zanŋ]，很薄而软，不结实；软弱无力，没有精神。古籍表示这一音义的有作“瓢”、“囊”和“穰”者。《农桑辑要》卷六：“先作熟穰泥，掘出即封根合泥埋之。”《蜀方言》：“质弱力薄曰囊。”原注：“《扬子方言校证》：‘今江淮人谓质弱力薄者曰囊，读平声。’”现代方言软、弱字多作“瓢”，在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皆有分布。今黔北除遵义作“穰”外，其他方言点皆作“瓢”，音义相同。

(3)胞[p'auŋ]绍[sauŋ]^①，松软、酥脆。黔北质地疏松，不坚硬都用“胞”，字亦作“泡”。这一词汇在北京官话、中原官话、吴语、湘语、西南官话都有分布，应该是明清以来的通语词汇。川渝方言“泡”还有浮肿、轻浮等义，黔北也有“他脸都泡起了”，就是指“浮肿”。但“轻浮”义在黔北未见使用。

这类词还有很多，例如跼[k'uŋ]表蹲、住；跽[tsuaiŋ]表示跌倒。“跽”是“跌”、“蹶”的变换音符字，因有“跌倒”之义，其音[tsuaiŋ]者，当为“摔”的方俗读音。“跽”之“跌、摔”义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啄[tsuaŋ]表埋着、低着、用脚踢。这个词来源于成都话，属于西南官话的一个特征词，还有挖掘、低垂、低下、踢、砸、敲、突出等义。重庆话中还有“啄”义，表“啄”义音[tsuaŋ]，如“小鸡在啄米”、“菜叶子遭雀雀儿（小鸟）啄[tsuaŋ]了”；车身[ts'eŋ]表转身，四川方言音[ts'eŋ]。表“转动”义的“车”，在北京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吴语、赣语、湘语、闽语中均有分布，黔北遵义、毕节（沿河音[ts'eŋ]，大方音[ts'eŋ]）都有分布。

当然，也有些词汇是《俗语》见收，而现代黔北方言不再使用的，如“见人物之可夸者曰嗚呼”、“可鄙者曰噫嘻”、“女工曰针黹”、“面散者曰髻音勃”、“伤痕曰痛痛音甫论”等词，《蜀语》《俗语》皆收，是明清时期川黔方言的通行词汇，但现在基本上消亡了。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蜀语》中有很多词汇，《俗语》没有收录，但在今黔北方言中却经见使用。例如《蜀语》：“草伏火中未燃曰沤。”《俗语》未收，今黔北方言“焐灰”、“焐烟”、“焐火石（未燃尽的炭）”皆此词。《蜀语》：“盛穀器曰囤。”《俗语》未收，但黔北地区称储谷器为囤子，正是这个词。《蜀语》：

①“胞绍”中“绍”是个记音字，本字为何尚待查证，“sauŋ”是西南官话常用的一个特殊词尾，表示对某种事物状态或性质的描述，主要用以强调或修饰它前面的词素，如“宽 sauŋ”即指宽敞、宽大；“胞 sauŋ”即指酥软，疏松；“松 sauŋ”即指轻松、宽松；“亮 sauŋ”即指明亮、敞亮；“空 sauŋ”即指空旷、广阔。

“扬米器曰簸箕。”《俗语》未收，今黔北方言有簸簸儿、簸箕、簸盖儿，是比筛子稍大一点的扬米器。前文讲到，《俗语》未抄《蜀语》的词汇有 220 余条，这些词汇应该是在《俗语》之后，从川渝方言流传至黔北，对黔北方言产生持续性影响。

三 今黔北的主流方言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已经知道今黔北方言既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川黔方言词汇，又不断受到川渝方言的影响。那么明清以后，黔北方言的变迁方向是否与川渝方言一致呢？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黔北方言与川渝方言的对比来解答，我们发现以下三种情形：

（一）川渝方言有，黔北没有

这类词有些是川渝固有的特征词，在其他地方没有分布，有些是外来的词汇而没有流入黔地，但都体现了川渝方言与黔北方言的差异。

（1）傻[teɪ⁷]，《蜀语》：“小子曰傻。”今川渝方言仍常用此词，指排名最小的儿子，或是对小孩童的统称，还有“傻傻”、“傻傻娃儿”等词。《集韵》入声职韵节力切：“傻，小。”川渝方言“傻”或来自于唐宋通语。黔北方言未见其用

（2）胶黏[nian¹]，《蜀语》：“稠膩曰胶黏。”今川渝方言经用此词，“黏”亦作“粘”，还有胶粘粘、胶胶粘粘等词形，都表示非常粘。“胶黏”一词，是唐宋以来的一个通语词汇，欧阳修《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胶粘。”《朱子语类》：卷九：“真个下工夫见得底人，说来自是胶粘。”用以形容心情、境况等胶着、贴切等。川渝方言“胶粘”一词，可能源自于中原官话，“黏”川渝方言有“[nian¹]”和“[nia¹]”两音，后一音与中原官话相同。黔北方言有“粘”，用法大致相同，是一个普通话词汇。

（3）聩[ɲau¹]，《蜀语》：“言不让人曰聩。”此词是川渝方言的常用词，如“这个人好聩哦”，表示嘴不饶人。《说文新附·耳部》：“聩，不听也。”是汉魏以来的一个通语词汇。《玉篇》“聩”引《广雅》：“不入人语也。”以音义求之，“聩”的本字当是“警”，《说文·言部》：“警，不肖人也。”《段注》改正：“不省人言也。”正是“不入人语”之义。今“聩”表示不听话、言语不让人，主要分布在西南官话，此外湘语（如浏阳）、赣语有少量分布，川渝方言还用以表示性格桀骜乖戾。黔北方言未见其用。

（4）打牢，《蜀语》：“放兵劫掠曰打牢。”此词主要在川渝地区使用，旧时指纵兵抢掠民财，这可能是旧社会现象的一种保留，今“打牢”一词，在川渝方言（四川达州）中用以表示观望、垂涎他人财或物。从词汇结构来看，“打牢”是川渝人结合古语创造的新词，“牢”古指祭祀的牲口，引申为各种财和物，“打”在西南官话中有“收获”、“夺取”等义，如川渝方言“打猪草”指收割猪草，“打抢”指劫掠、抢劫，“打牢”就有了劫掠财物之义。黔北方言没有这个词。

（5）糝[niao¹]，《蜀语》：“无赖人谓之糝。”此词川渝方言常见，也单用“糝”，表示人好耍无赖或小孩机敏、顽皮。这个词来源于江湘方言，《方言》卷十：“媯，狻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无赖，或谓之糝。”钱绎笺疏：“恐与糝声义并同。”“糝”《集韵》在平声肴韵丘交切，今音 qiāo，川渝方言读[niao¹]是方俗音。

此外，类似《蜀语》所收如“足音重浊曰蹶”、“墙曰埵”、“饮曰湔绵婢切”、“衣物委烂曰沔”、“顺言谑弄曰譖”等词，在今川渝方言仍广泛使用，但黔北方言鲜见其词。有些词是川渝方言固有的，有些是从其他方言区进入川渝的，但这些词可能都没能流入黔地。

（二）黔北方言有，川渝没有

这类词可能反映了《俗语》之后，黔北方言所受到的来自川渝方言之外的影响，有利于考察其性质。

（1）爇，《蜀语》：“火炙曰爇音考。又曰爇音助。”“爇”《说文》已收：“火热也。”是一个通语词汇，后经用“烤”字。“爇”《广韵》入声叶韵虚叶切：“火气爇上。”《集韵》同韵：“爇，火迫也。”今黔北方言“爇”就是这一用法的保留。今四川方言南路话仍有此词，湖广话没有这个词，但实际上重庆如梁平等地，仍有“爇”一词，如爇人、爇得很、火爇等，与黔北方言相同。

（2）家，词语后缀，多用以补充完整音节。黔北如一年家、一年子家、往年家、晚西家、夜晚家、

晚住家等词，都用后缀“家”补充音节，与不用词缀时意义相同，如往年家就是指往年，夜晚家就是指夜晚，晚住家就是指晚上。“家”的这一用法，在川渝方言中没有。

(3) 后首，即后来。黔北一般用“后首”、“后来”和“后头”表达时间居后，川渝没有“后首”一词。“后首”是清代以来的通语词汇，从成词方式来看，应该是以同义词素“首”代替“头”产生新词。“后头”本指后面、后部，是个方位名词，后来逐渐引申又可指时间上靠后。川渝方言“后头”既指方位，又指时间，黔北“后首”则只用指时间。类似通过同义语素替换产生新词的情况，在黔北方言中有很多，例如西南官话常用“咪”或“咪咪”表示“奶”或“乳房”，黔北方言就经常用“咪”替换“奶”构成新词，如喂奶（喂奶）、隔咪（断奶）、咪嘴嘴儿（奶嘴）等词，川渝方言则都用词素“奶”。

(4) 屎粪，人畜粪便，或垃圾。黔北方言常见“屎粪”连用，表示屎或粪，如猪屎粪、牛屎粪、鸡屎粪、狗屎粪。但川渝一般不连用，要么单用“屎”，要么单用“粪”，没有区别。在黔北方言中，“屎”和“粪”有区别，“粪”主要指类似于“屎”、“尿”一类的垃圾、肥料，用义比“屎”广。如“上粪”指施肥，“粪筛”指筛灰沙的用具。

此外，黔北如“门千”^①指外面、“拿抓”指餐馆乞食者、爹[tɿŋ]指叔父或姑母、“寄饭”指搭伙、“眼气”指刻意炫耀、“摔摆”指折腾刁难、“门事”指“体面”等都是川渝方言所没有的。这些词有些是黔北固有的，有些是从其他方言传入的，如“门事”一词在吴语中表示做事周到，黔北用作“体面”，与之义近。又如“粪”可用指肥料或垃圾，是保留其古义，与桂北方言（如柳州、三江）、粤语（如阳江）用法相同。

（三）川渝和黔北都有，但读音不同

从词汇系统看，有些词的用法和意义，在川黔方言中是相同的，但它们的读音却不尽相同。明清时期《蜀语》《俗语》音系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而今川渝和黔北方言大多数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古入声归入阳平。黔北只有赤水、桐梓等方言入声独立成调，与《俗语》调类相同。因此，有些川渝和黔北共有的词汇，在黔北地区往往读音不同，有些是在方音的影响下略有调整，有些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语音特征。

(1) 箴，《蜀语》：“竹箴曰箴音迷条。”今川渝和黔北都有箴条、竹箴、箴块儿、箴片儿等词，其中“箴”是入声，川渝黔多数读“[mieŋ]”，按西南官话规律，入声已归阳平，但黔北桐梓读[mieŋ]，赤水读[miʔ]或[miŋ]，皆保留入声，其语音特征是承自《蜀语》《俗语》的。

(2) 搯，《蜀语》：“手裂物曰搯音灭。”《说文·手部》：“搯，批也。”《广韵》入声薛韵亡列切：“手拔也。”《蜀语》《俗语》音“灭”，与中古音相同。川渝、黔北皆经用此词，字或作“搯”，音义相同，表示掰、折断、以手裂物。川渝一般读[mieŋ]或[mieŋ]，与湘语（如长沙）音同，只有少数地方如达州音[miŋ]，而黔北如遵义音[miŋ]，桐梓音[miŋ]，保留了《蜀语》的读音。

(3) 泔，《蜀语》：“饮曰泔绵婢切。”《说文·水部》：“泔，饮也。”《广韵》在上声纸韵绵婢切，《蜀语》与之音同。“泔”表示小口啜饮，后作“抿”，今川渝和黔北如“泔酒”、“泔嘴儿”、“泔一口”、“泔一杯儿”等皆此义。这个词，川渝方言一般读[miŋ]，黔北如遵义、桐梓也读[miŋ]，这个音可能来自湘方言，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四·长沙方言续考·泔》：“今长沙谓以口饮酒少许为泔，音正如泔。”但黔北如赤水等地仍读[miŋ]，与《蜀语》《俗语》相同。

(4) 躡，《蜀语》：“足踏曰躡钗上声。”《说文·足部》：“躡，舞履也。”本义是“舞鞋”，或作“蹠”，《龙龕手镜·足部》：“蹠、躡，二正，所绮所寄二反，徐行貌，又舞履也。”^②《玉篇》《广韵》等收录相同。典籍“躡”又或作“蹠（躡）”异文，《庄子·让王》“原宪华冠蹠履”陆德明释文：“蹠，《三仓解诂》作‘躡’，云‘蹠也’。”则“躡”引申出踩、踏之义。《广韵》“躡”在上声纸韵所绮切，与“蹠”、“蹠”古音相同，折合今音读 xī；《蜀语》“躡”注：“所蟹切，钗上声。”源自《集韵》所著又音，折合今音读 sǎ。今天“躡”川（成都）、黔（遵义）方言一般读[niŋ]，表示踩、踏之义，与江淮官话（湖北麻城）、赣语（湖南常宁）相同，“躡”读[niŋ]是应该是受声符“丽”和词义“蹠”产生的方言音变；而黔北（遵

① 吴伟军教授告知笔者：这个词应该是“门前”，“前”之所以读为阴平，是中和调，也即轻声的特殊表现形式，跟“高头”、“前头”、“樱桃”等词的后字读高平调是同样的性质。谨此致谢！

② 释行均《龙龕手镜》（影印高丽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2页。

义)仍保留了[ciŋ]这一读音(许宝华、宫本一郎 1999: 6832),呈现出部分差异。

四 结语

透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黔北方言发生了以下变化:

(1)黔北方言无论在地域还是语言上,与之关系最紧密的都是川渝方言,《俗语》抄录《蜀语》是最有力的证明。从《蜀语》到《俗语》的明清时期,正是西南官话形成且成长的重要阶段,历史上黔北如遵义等地曾隶属四川,可以认为直到晚清时期,黔北方言与川渝方言仍属于同一个音系和词汇系统,其历史层次就是以《蜀语》《俗语》为代表的古代川黔方言。

(2)《俗语》之后的黔北方言,仍然主要受到川渝方言的影响。一方面,《俗语》未抄的《蜀语》词汇,后来出现在黔北方言中,说明川渝历史方言对黔北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川渝地区形成的“湖广话”词汇,在今黔北方言中也有相当高的比例,但与川渝地区直接受湖广移民影响不同,黔北流行的“湖广话”词汇是在进入川渝之后,再辗转传到黔北的。虽然根据自身的方言实际对有些词汇的形、音、义略作了调整,但并不影响黔北方言整体面貌与川渝方言接近。

(3)今黔北方言的主流是“川黔话”,其整体特点与以川渝黔方言为主体的“川黔派西南官话”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一是保留了大量古代川黔方言词汇,二是整体特征与邻近的川渝方言趋同,这是黔北方言与黔中、黔南、黔东南方言存在差异的原因。

(4)今黔北方言与川渝方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清代中叶以后黔北地区划归贵州,开始接受中心城市贵阳及其语言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黔北地区及整个贵州开放程度加强,汉语普通话和外区方言的不断渗入,也在黔北产生了新的方言成分。此外,有些移民是直接来到黔北的,他们带来的方言在黔北被融合改造为当地特有的词汇,再加上黔北地区的土著词汇,都与川渝方言形成了一定的差异。

(5)随着黔北与外界交流加强,语言的渗入是多方位的,明清移民为黔北带来了吴语、赣语、湘语、粤语、江淮官话、中原官话等多种方言成分,但进入黔地最多的还是川渝移民,黔北常用“川军儿”指外来务工者,实际主要指的就是来自川渝地区的人。由于川渝方言优势明显,对黔北方言影响根深蒂固,其他方言都未能从性质上改变黔北方言。

综上所述,近四百年黔北经历了从“明清川黔方言”到“现代川黔话”的变迁,今黔北方言的主要成分有两种:一是历史留存的明清川黔方言,二是在川渝方言影响下产生的“现代川黔话”。随着后者影响的加深,前者在黔北的空间已经大面积萎缩,这在曾属于西蜀方言区的遵义、桐梓、赤水等地表现最为明显。与川渝地区受湖广移民而形成新的方言层次不同,黔北地区虽然也受到移民影响,但这些移民方言都难以与具有绝对优势的川黔方言竞争,无法改变黔北方言的根本性质,因此黔北地区经历的是“优势方言”起主导作用的变迁方式,而非“移民方言”。这一点,对于判断西南官话的来源与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64 《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陈遵平 2003 试论清代遵义话的几种语音现象,《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黄雪贞 1986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第4期。
蒋宗福 2002 《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巴蜀书社。
李葆嘉 2004 汉语方言格局历史演变论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李蓝 2009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第1期。
李荣主编 1993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明生荣 2007 论毕节方言的词汇构成,《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
潘悟云 2009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方言》第3期。
钱曾怡主编 2010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
肖永凤 1996 六盘水方言概述,《六盘水师专学报》第1期。

- 许宝华、宫本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詹伯慧 2002 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第4期。
- 张一舟 1994 《蜀语》音注材料分析，《语言研究》增刊。
- 甄尚灵、张一舟 1992 《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方言》第1期。
- 周及徐 2012a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成渝方言与湖北官话代表点音系特点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周及徐 2012b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第3期。
- 周及徐 2013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第1期。
- 周及徐、周岷 2017 《蜀语》与今四川南路话音系——古方言文献与当代田野调查的对应，《语言研究》第2期。
- 周岷、周及徐 2016 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语文研究》第3期。
- 遵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2012 《遵义方言志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Changes of Northern Guizhou(贵州) Dialects Since Ming(明) and Qing(清)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bulary Comparison

Shi Guang-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Guizhou(贵州) dialects were directed successors of Sichuan(四川) dialects from late Ming(明) dynasty to late Qing(清) dynasty, which was the ancient level of northern Guizhou(贵州) dialects. After *Shuyu*(蜀语), the Huguang(湖广)-dialects were taken to Sichuan(四川) and Chongqing(重庆) by Huguang(湖广)-immigrants, which made new Chuanqian(川黔)-dialects and become the new level of northern Guizhou(贵州) dialects. Since Ming(明) and Qing(清) dynasties, northern Guizhou(贵州) was not influenced by immigrants to form new dialects like Sichuan(四川) and Chongqing(重庆), but keeping more ancient dialects and appearing a large number of Chuanqian(川黔)-dialects vocabularies. The Changes of Northern Guizhou(贵州) dialects were dominated by the dominant dialects, not the immigrant dialects.

Key words: *Suyu*(俗语); Ming(明) and Qing(清) dynasties; Northern Guizhou(贵州); Southwestern mandarin